

历代文豪传

王洲明 郑训佐 主编
张 涛 叶 明

山东人民出版社



历代文豪传

主 编 王洲明 郑训佐
张 涛 叶 明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7年·济南

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审视

(代序言)

文学的发展史不是几个文学家的历史。中国文学的发展史也绝不可等同于十几位、几十位、上百位大文豪的个人史、创作史。但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十几位、几十位、上百位大文豪的创作，是建构文学史的重要内容、重要的环节，具有无可取代的重要性。文豪是文学发展史上的灿烂群星，他们的创作是文学发展史上的重要闪光点，他们的创作所体现出的精神，构成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精神。

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构成是非常复杂的。生活时代、生活经历的不同自不待说，信仰不同，情趣不同，处世态度不同，艺术风格、艺术成就也不同。但是，受共同的中华文化的熏陶和影响，在历代作家身上又确实体现出一些共同的东西。

中国古代作家群体具备积极进取的精神。儒家主张的“立德”、“立功”、“立言”的作人标准，成为绝大多数古代作家行动的准则，而占重要地位的是“立德”、“立功”。从屈原的“来吾导夫路”，到李白的“大济苍生”，到杜甫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到王安石的“贱术纵工难自献，心忧天下独君王”，到苏轼的“一箫一剑平生志，负尽狂名十五年”，表现的都是建功立业的宏图壮志，至于终生为文，是他们在“举业”开始时不曾想、或不乐意想的事情。他们大多也确曾在举业路上奋斗挣扎，砭砭以求，其艰难困苦之状，凄凉悲惨之情，恐怕是今人所不能想象的。杜甫的“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

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他十年困顿长安期间求官无路的自述。李白在《与韩荆州书》中讲了自己“十五好剑术，遍干诸侯；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的光辉之后，说“今天下以君侯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一经品题，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阶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扬眉吐气、激昂青云耶？”这简直有点为获取功名而低三下四了。蒲松龄自弱冠应试，至鬓白而终未第，写下“天孙老矣，颠倒了几多杰士？蕊宫榜放，直教那抱玉卞和哭死！病鲤暴腮，飞鸿铍羽，同吊寒江水”的词句，不仅有痛苦简直还有怨愤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古代作家的大多数来讲，首要的是作官，是从政，至于成为一个舞文弄墨的文人，实在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事。孟子曾云：“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中国古代作家是真正奉行这一准则的一群人。他们首先是要“达”，“达”的目的是“兼济”，而一旦“穷”后他们又能独善其身。似乎儒家倡导的许多美德，情有独钟地集中在他们身上，这现象本身就很值得我们思索。

儒家书中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容，这是教士人如何渐次地对国家民族做出自己的贡献；宋代范仲淹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从个人品德方面总结出封建时代的文人应该具备的美好品质。因而“忧国忧民”、“为国为民”，构成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又一精神特征。

在古代作家心目中，一般讲爱国也就是爱民，爱民也就是爱国。当然，因作品中爱国和爱民的内容有所侧重，我们也可以有所区别。“爱民”表现为对人民痛苦生活的记述描写与深深同情；表现为对各级残民之贼种种行径的揭露批判和深恶痛绝；同时还表现为对人民伟大作用的认识。从屈原的“皇天之不纯命兮，哀民生之多艰”，到王粲的“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难”，到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到白居易的“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到李绅的“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到

郑燮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还有描写元代人民痛苦生活的《窦娥冤》，描写波澜壮阔的农民战争的《水浒》，都是爱民的最集中的表现。这些作品自觉不自觉地触及到了阶级社会中最基本的矛盾即阶级的对立，表现出最可贵的民胞物与的民主精神。“爱国”的内容可以表现为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关心，可以表现为对祖国壮丽山河的歌咏赞颂，更可以表现为当异族入侵时的激烈的抗争。先秦时代，国家的概念并不很明显，直到春秋战国，楚材晋用的现象仍然十分普遍。秦汉时国家定于一统，特别是受儒家思想中“华夷之变”、“大一统”思想的影响，国家、爱国的观念在士人的心目中突现出来。再仔细推究，这种爱国的感情更多地来自对华夏正统的认同和对夷狄入侵的憎恶和反对。从某种意义上说，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合二而一。刘越石击节中流，慷慨悲歌，表现的是要收复被鲜卑占领的失地的决心。辛弃疾的“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张元干的“梦绕神州路”，岳飞的“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陆游的“北望王师又一年”，表现的都是宋金对峙形势下，抗金卫国收复失地的决心。为反抗元占领中原，陈文龙写下了“须信累囚堪衅鼓，未闻烈士竖降旗”，文天祥写下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壮烈诗句。明清易代之际，又是乾坤颠倒，山河易色，无数志士仁人或哭或泣或叹或歌，甚至不惜杀身成仁。从今天来看，朝代更替，民族争端，是实现民族大融合的自然进程，但我们又必须尊重历史，承认这些民族英雄、仁人志士所表现出的热爱故国、反抗侵略、不畏强暴、坚持操守的精神，充分肯定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惊天地、泣鬼神，可以与天地同寿与日月同辉的光辉品格。这种品格已成为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民族兴盛发展的重要保证。

坚持正义，反对邪恶，不向邪恶势力屈服投降，是古代作

家又一非常宝贵的品格。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造成政治生活的畸形发展，这就是君主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最理想的政治也只能是君明臣忠、父慈子孝、兄爱弟敬。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开明的君主，但就是这样的君主，也豢养着庞大的官僚机构并聚集着不少的是非小人，就更不用说昏聩的君主了。屈原遇到的欲尽忠而不能得、欲立功而不能为的境遇，可以说历代有之。许多作家由于首先是王朝官吏，所以不可避免地时时处于政治动荡之中，或主动、或不情愿地陷入政治旋涡或朋党之争，然而争斗带给他们的往往不是飞黄腾达、加官晋爵，而是遭贬外放，远徙他乡。汉代的贾谊因与“绌灌”不合而被远徙长沙，作了异姓王的太傅。李贺、李商隐在延续了半个世纪的牛、李党争中深受其害，甚至毕生沉沦。也同样是在唐代，韩愈因谏迎佛骨遭贬，“永贞革新”中先受重用后遭打击的刘禹锡、柳宗元都曾被远谪荒凉不毛之地。至于宋代的“乌台诗案”，明清大量的文字狱，当事者更是轻则被远谪，重则被杀头。每当我们读他们的传记时，都对他们的遭际感到深深的同情，但又非常敬重他们身处逆境中的生活态度。贾谊虽然贬到长沙后也发了一阵牢骚，但《治安策》中的许多主张都是在长沙任中反复考虑成熟的。韩愈“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但仍然表示“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受到打击最大的刘禹锡吟出了“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豪壮的诗句。柳宗元远贬柳州后的闪烁山水灵秀和一腔正气的“永州八记”，苏轼流放岭南，“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达观豪放潇洒。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形成一种内修外美的人格追求。后代身处逆境中的许多作家，之所以没有消极沉沦，人格力量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道家的放任自然，随遇而化，知足长乐，无疑也是他们面对现实，超越自我，获得精神自由的力量。

真正地热爱生活，真诚地拥抱生活，真心地珍惜生活，是古代作家精神品格的又一重要特点。情感是文学必不可少的条件，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能世代激动人心，就因为那是感情的结晶，是生命的歌唱。试想，曹雪芹如果不热爱生活、拥抱生活，能够在“悼红轩”内批阅十载写出“悼金惜玉”的《红楼梦》吗？杜甫如果不热爱生活、拥抱生活，能写出史诗般的作品从而获得“诗圣”的称号吗？李白如果不热爱生活、拥抱生活，能写出惊天地、泣鬼神、壮浪纵恣的诗篇，从而获得“诗仙”的称号吗？关汉卿如果不热爱生活、拥抱生活，能写出感动天地的《窦娥冤》吗？活跃于生活激流中的古代作家敏感而又富有感情，同情关心人民的疾苦，讴歌祖国的壮丽山河，缅怀民族英雄、民族的历史，抒发对亲人、朋友最真诚的感情。这些内容都凝结成文学史上最美丽的篇章。

“黄河之水天上来”，让我们领略了黄河的气势；“燕山雪花大如席”，让我们想到大西北冬季的景色；日出江花红似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让我们领略了江南水乡景色的秀丽；“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不仅是对壮丽山河的歌颂，而且包含很深的哲理情趣。至于像“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既对历史又对民族都怀有深深的感慨了。

中国古代的寄内诗、悼亡诗很多，这是古代作家夫妻感情的真实流露。《诗经·唐风·葛生》中说：“夏之日，冬之夜，百岁之后，归于其居”，“冬之夜，夏之日，百岁之后，归于其室”，表示出对丈夫深深的思念。潘岳有“之子归穷泉，重壤永幽隔”，“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的诗句，真是物存人亡，其伤何如！再比如苏轼思念亡妻而写下“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

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李清照伤悼丈夫赵明诚而写下“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诗句，真感到已经是声泪俱下了。

古代作家重交友、重友情，而且追求志同道合。唐代大诗人李杜之间的友情，这是我们都熟知的了，李白与杜甫沙丘城相别，有“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的诗句。多少年后，李白遭贬放流，杜甫由于得不到李白的音讯，无限哀伤地写道：“不见李生久，佯狂殊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杜甫与另一盛唐诗人高适的情谊也是很值得称道的。不仅他们早年相交相知，晚年虽身份地位大不同，但仍笃于友情。高适晚年做到蜀彭二州刺史，为一方最高行政长官，而杜甫乃贫病一老叟。高适在蜀州有一诗寄杜甫：“人日题诗寄草堂，遥怜故人思故乡，柳条弄色不忍见，梅花满枝空断肠。身在南蕃无所预，心怀百忧复千虑，今年人日空相忆，明年人日知何处？一卧东山三十春，岂知书剑老风尘，龙钟还忝二千石，愧尔东西南北人。”诗中对故交杜甫表示了深深的思念。柳宗元和刘禹锡的友情更令人敬佩。“永贞革新”失败，柳、刘同时遭贬，刘禹锡贬为播州刺史，柳宗元贬柳州刺史。播州古称夜郎，唐时仍十分荒凉。刘禹锡此时有80岁老母，风烛残年，也要一道跋涉。柳宗元主动提出自己与刘禹锡对换，到更加荒凉的播州。韩愈与柳宗元的友情也很难得，他们的政治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柳宗元辞世后，韩愈为之撰写了《柳子厚墓志铭》，不仅记述了上述柳宗元“柳易播”的壮举，而且评论道：“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引一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

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这一大段议论，赞颂了子厚危难见真情的交友之道。宋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友情也很值得称道。欧阳修死后，王安石和苏轼都撰写了《祭欧阳文忠公文》，都“大处落墨，劲气直达”地追述歌颂了欧阳修在政治、文化事业上的作为和进退有据的高风亮节。

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十分突出的现象，即每个时代几乎都有文学集团出现。文学集团形成的原因是复杂的，集团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千差万别，但其中很多是用友情的纽带连结起来的。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苏门四学士”等等。中国古代文人的交友之道，还非常看重品格，“道不同不相与谋”，与其说是指政治主张的不同，毋宁说更多是指为人之道。汉代的杨惲在被罢官后写了《报孙会宗书》，因为杨惲在无故遭贬后，作为朋友孙会宗不但不表示同情安慰反而帮助当政者严厉指摘告诫。魏的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和《与吕长悌绝交书》。前者是因为在司马氏保护伞下的山涛要高升，便推荐嵇康来接替他的原职。后者是由嵇康的朋友吕安引起的：吕安的堂兄吕巽是司马昭的亲信，也曾与嵇康交友。但此人是个“衣冠禽兽”，他强奸了吕安之妻，却诬告吕安不孝，害得吕安充军塞外。原先嵇康顾全吕家声誉居中调解，今见此结果，才知道上当，于是写信与吕巽（字长悌）绝交。结果是嵇康受“吕安事件”牵连而被逮下狱。写给山巨源的信给嵇康埋下了被杀头的种子，而写给吕长悌的信终于成了被杀头的导火线。我们自然还会想起李密的《陈情表》、韩愈的《祭十二郎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夏完淳《狱中上母书》等，都表现出真挚挚极丰富的亲情。“文章岂是无情物”，我常想，中国古代作家很少有自杀的人，这与西方作家不同，他们热爱生命，热爱生活同时也享受生活，笃于友情。这是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深层意识中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从大的哲学范畴来说，人面对的一是外在世界，一是自己的主观意识。而外在的世界，一方是社会的，另一方是自然的。中国古代作家中，多数人走的是“兼济”的道路，但也有不少的作家，由于时代的、个人的等原因，较早地投入到大自然的怀抱，或者追求自然天性，以与名教和世俗相对抗。表面上，他们似乎是时代的落伍者，但实际上他们内心蕴积丰富的感情，是时代的另一类宠儿，创造了文学史上的光辉诗章。阮籍、嵇康等为了反抗司马氏以提倡名教来掩盖篡权的野心，提倡自然天性，向内心自我发展。阮籍“志气宏放，傲然独得，任性不羁，而喜怒不形于色”，“嗜酒能啸”，“当其得意，忽忘形骸”；而嵇康“天质自然，恬静寡欲，含垢匿瑕，宽简有大量”。他们都写了不少流露真性情的好文章。比如阮籍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等，都是心迹的表露，又充满哀世的不平之音。陶渊明处于晋宋易代时期，他为了保持自己的真性情，选择了山野自然，远离尘世，追求心灵深处的安闲和陶醉于大自然的美景。他的诗作蕴含着自然、清新、静谧的美感，被后代文人称为“千古隐逸之宗”。唐初诗人王维和孟浩然也最终投身于山水田园的大自然中间。王维作过高官，或许是对碌碌人生的厌倦，发展到参禅礼佛，不问时事。他的山水诗诸如“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欲投人处宿，隔水问樵夫”等都渗透着深深的禅趣禅理，这是追求人生自我的别一种境界了。孟浩然是求官而不得，“无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所以走向了田园，“开筵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中唐的储光羲、张志和、韦应物等，也都写了一些表现田园风物自然美景的诗篇。宋代的姜白石、林和靖，也可归于此类。姜白石一生未仕，词作多为写景咏物及记游，后者隐居杭州孤山。元代的王冕隐居不仕，诗多写隐逸生活。到明清，或许因为经济发展，或许

因为思想多元变化的影响，纯粹追求内心世界那方平静乐土或是退守田园享乐自然风景的作家愈来愈少。如“性灵派”诗人，虽然也主张文学必须抒写真性情，也主张范山模水，写出了不少歌咏自然美景的诗章，但与把自然作为人生目的的作品所表现出的那种率真、亲切，总不是一回事。其实，这种文化、文学现象是值得深入探究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是一条历史的长河，浩浩荡荡，烟波浩淼，气象万千。在它的面前，任何的划分都是显得不科学，任何的描绘都不可能穷形尽貌。中国古代文学，又是在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因此，它必定带有自己的规律和特点。中国古代作家在文学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既是一个个微小的个体，又形成一个伟大的群体；他们既是创造者、开拓者，同时又是继承者、发扬者。就个体的多样性而言，他们的个性铸成了文学史的璀璨夺目、风格纷呈、光辉灿烂；就总体的统一性而言，他们又共同铸就了文学史发展中的共性特征。

和任何其它事物的发展一样，中国文学的发展遵循一条否定之否定的矛盾定律。每一次的否定，并不是简单地推倒重来，而是一个扬弃的过程，是一种发展变化的不断上升的圆圈运动，是在批判继承旧的基础上，创造出新的事物来，从而保证了文学健康发展。比如中国文学史上各类体裁的产生，是遵循了这样的运动规律。由四言诗到五言诗，由五言诗到七言诗，由古诗到近体诗，由诗到词，由词到曲，都是后者扬弃前者而产生出的新的诗歌形式。它们一环相扣一环。赋的产生“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它受楚辞很大影响是可以肯定的。它刚产生为一种新的文体时，也曾经出现过不少文情并茂的作品，如贾谊的《吊屈原赋》、《服鸟赋》，枚乘的《七发》，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哀士不遇赋》等等。只是因为适应政治需要，一味地铺陈，发展到极至，“靡而不能加也”，走向自己的反面。

所以东汉的赋，既是汉大赋的鼎盛期，又是终结期，一种新的抒情小赋如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嫉邪赋》应运而生了。至于六朝的骈赋、唐朝的律赋，又是在继承汉赋基础上另辟蹊径。代表盛唐气象的唐诗，把诗歌艺术发展到极至，但宋人偏要“柳暗花明又一村”，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虽说引起后代不同看法，但毕竟丰富了诗歌的表现领域，而且也确实写出了不少风格清雅的诗歌。小说的发展又何尝不是如此。从史传到志怪，从志怪到志人，从志人到演义，从演义到世情，一直到被鲁迅先生誉为“传统的手法都被打破”了的《红楼梦》的出现，都经历了否定之否定的运动过程。中国文学史上曾出现过许多变革现实的运动，这些运动产生的条件各异，运动领袖往往就是重要的作家，而提出的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又是对前代理论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否定”。比如，魏晋六朝的文学对于先秦两汉来说，其发展的痕迹是非常明显的。它注重抒情，注重写景，注重语言言辞的优美，这本来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文学在进步的同时，又走向另外的极端，比如像南朝君臣，把文学变成表现一己私欲的侍婢，整个文风柔弱浮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唐代陈子昂振臂高呼，提倡“风雅比兴”的现实主义传统，经后来的韩愈、柳宗元最终完成的“古文革新运动”，恢复了“宗经”“载道”的古文的正统地位。唐代文学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和“古文革新运动”是分不开的。事物总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到了晚唐五代，文风又发生变化，一味讲究词句艳丽，追求声律工整的骈文逐渐占了上风。在诗歌创作方面，一反现实主义的创作，而陷入内容低级、形式唯美的泥沼。比如五代的《花间集》就是代表。北宋初年，继承唐五代的文风诗风，文章追求“晚唐体”、“五代体”的时文；诗歌占统治地位的则是因袭晚唐、五代诗风的“西昆”诗派。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掀起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前

驱是柳开、王禹偁、石介等人，而梅尧臣、苏舜钦、尹洙、欧阳修用理论和创作同时并举的方法扩大影响，把运动逐步引向深入，而最终以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等人大力实践而宣告取得最后胜利。这中间包含有几代人的心血！明清文学集团就更多了，“竟陵派”、“唐宋派”、“前七子”、“后七子”等等，他们各有各的主张，但都是在“扬弃”、“损益”的过程中发展前进的。纵观中国文学史的动态运动过程，中国古代作家特别是著名作家的创作实践功不可没，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他们肩负起时代的重任，作出了继往开来的伟大事业，推动了文学的进步。

中国古代作家群体，与市井百姓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他们大多数原本就是平民百姓中的一员。这就决定了他们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的营养，保证文学运动永远充满生机和活力。屈原是最先向人民学习汲取创作营养的作家，他的《九歌》甚至《离骚》都受到民间招魂词的影响。荀况是思想家，但他也能自觉地向民间学习而写出《成相》那样的带有说唱特点的文学作品。比如词的产生，属于民间的敦煌曲子词的影响是有目共识的，白居易、张志和就是最早学习民间，创作词的作家之一。白居易的《长相思》，白居易的朋友刘禹锡有两首《忆江南》（和白居易），都带有早期民间词的特点，在词的发展史上占居一定地位。宋代那姹紫嫣红、风格迥异、流派纷呈的词，正是从这里滥觞的。至于民间说唱文学对于戏曲产生的影响，就更加明显了。许多著名剧作家，他们自己就曾“混迹”于歌楼酒肆，也曾扮演旦末净丑，和下层市民一起演唱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关汉卿自己就说过：“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关的好朋友贾仲名说他是“驱梨园领袖，总编修师首，捻杂剧班头”，这是很切合实际的评价。中国文学史中有所谓俗

文学一流，这一流与民间的关系就更加密切。《诗经》中的《国风》都承认是最早的民间歌唱，但又应该是受到乐官加工的结果，而“乐官”就是对重视、保留、流传民歌作出贡献的最早的文人“作家”了。《孔雀东南飞》、《木兰诗》等优秀民歌，既是民间歌手集体创作的产物，同时也渗透着不知姓名的文人作者的心血。我们还会想起唐代的刘禹锡，他被流放到“巴山楚水”的一段时间，很注意向民歌学习，当地《竹枝词》的“含思宛转”深深打动了，不仅爱听会唱，还亲自创作了《竹枝词》十一首。如“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还有情”运用了谐声双关，使诗清新淡远而韵味无穷。再比如元明的散曲、明清小说都是作家先从民间汲取有用的营养，逐渐发展起来的。鲁迅先生曾指出：“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慢慢的绞死它。”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种重要现象，其深层原因也是很值得研究的。

或许与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官本位”思想有关，或许他们主要受到儒家“立德”、“立功”、“立言”的教育熏陶有关，中国古代作家理论上主张“文以载道”的居多，而他们的创作实践，则以表现国计民生的题材居多。这是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又一个特点。这里讲的居多，是说除此而外，仍还有一些其它的文学主张和多样性的创作题材；但无论如何，主张文学表现现实生活，主张文学要有实际内容，创作反映主要矛盾和重大生活事件，则始终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从《诗大序》的“言志”说，到《文心雕龙》讲“征圣”、“宗经”；从曹丕的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胜事”以及“文气”说，到陈子昂倡导“汉魏风骨”、“风雅比兴”；从韩愈的“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于言也亦然”，到欧阳修的“诗穷而后工”，都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程度地涉及到文学对现实生活的干预。进入明

代，先有宋濂的明道致用，后有“前后七子”的拟古以及“公安派”、“竟陵派”的反拟古，也都注意到文学反映时代的特征。文学主张如此，创作实践就更加明显。现实主义源头的《诗经》反映社会现实、人间疾苦自不待说，就是以浪漫主义著称的楚辞，同样歌咏的是南楚的兴衰以及屈原的忠君报国之志。纵观一部中国文学史，凡诗、文、辞、曲、戏剧、小说，真正有生命力的，真正能称得上史诗般作品的，真正在文学史上永垂不朽的，大多应该是那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是那些反映人生疾苦的作品，是那些文情并茂的作品。有人可能会提出如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南山”；如王维的“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如张籍的“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如王士禛的“萧条秋雨夕，苍茫楚江晦。时见一舟行，濛濛水云外”等等，都是脍炙人口且永世长存的诗篇。但文学史上的这一类作家、作品，始终未能占居主流地位。而且，如果仔细推究，他们的任何细微的感情变化，都应该是特定时代、特定时期社会生活折光的反映。

我们还注意到，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艺术追求迥异，创作风格多姿多采，但他们又都创造、凝聚同时遵从中国文学艺术的最高美学标准——以和谐为美，都追求“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仔细观察中国文学造始阶段的《诗》《骚》，它们都体现出和谐为美的追求。《诗》的内容真正是暴露批判的很有限，大多为劝谏的内容；《诗》的形式基本以四字为句，又多以四句一章，都体现出一种平稳、和谐。《骚》的内容也是“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发泄愿做忠臣而不可得的怨愤不平；《骚》的形式比《诗》当然有发展，但无论是每句诗字数的增加，或者是每篇诗结构的宏大，也都透露出整蔚有序的特点，体现出一种均衡的美。“比兴”是中国诗、甚至中国艺术的精髓。《诗经》中的比兴，最早沟通了诗人创作主体和外界自然的联系，形成了最早

情景交融的诗。“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外界红火欲燃的桃花和新嫁娘的美丽漂亮同时出现在一个画面之中，起到了主观的情和客观的景相互作用的目的。《楚辞》当中有“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的美丽诗句，它已经通过对景物的描写来创造情景交融的意境了。沿着《诗》《骚》开辟的道路发展，情景交融成为中国文学艺术最高的美学追求，成为中国人的最高审美标准。在后世岁月里，南朝何逊有“客心已百念，孤游重千里。江暗雨欲来，浪白风初起”；唐柳宗元有“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元人马致远有“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宋人王安石有“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三十六陂春水，白头想见江南”。在戏剧中，《西厢记》中有“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牡丹亭》中有“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朝飞暮卷，云霞翠轩；雨丝风片，烟波鱼船——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即使小说如《红楼梦》都处处渗透着作者情景交融诗意美的艺术追求。

中国古代作家群体的创作实践，使得中国古代文学具备许多特点和成就，比如音韵的铿锵和谐，对仗排比，比如以画入诗，诗画合一等，都是我们民族所独具的。

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原因又是极其复杂的，讲清它同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从文学创作的主体古代作家的角度来考虑，我们思考了下面的几个方面的问题。

中华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相比，是一个多苦难的民族。黄河流域地理环境气候条件相对恶劣，在民族形成初期对民族性格已经造成了影响，因此，我们民族更多一些深沉稳重的特点。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天灾人祸频仍，人口的快速增长和食

品的相对匮乏，生存成了人们生活中的第一要义。读中国的二十五史，每每能读到“流万户”，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屠五城”、“赤地千里”、“易子而食”这样的记载，人民忍受的痛苦就可想而知了。中国历史上的战争非常多，其中有一些是民族间的战争，因此中国的兵书就特别的发达，连《老子》那样的书都讲了许多打仗的道理。而哪一次战争不是“争城一战杀人盈城，争野一战，杀人盈野”？民族战争更为残酷，元统治者入主中原，全国人口锐减了一半；清统治者入主中原，“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大肆屠杀的结果，全国人口也大大减少！中国封建社会延续了两千多年，其专制高压制度造成的统治者内部相互倾轧、忠奸斗争又不知使多少人满门抄斩，家破人亡。凡此种种，都使生活在人民中间的作家们，和我们的民族一道经历了长期的历史磨难，使他们具备沉重的历史责任感和深深的忧患意识，这就是古代作家反映人生内容的作品始终居于主流地位的深层原因。说“愤怒出诗人”也好，说“诗穷而后工”也好，总之，是古代作家们从民族的苦难历史中汲取了创作的力量，从而能代代相传，经久而不衰。

中国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国家，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既有血与火的洗礼，又经过了文化的碰撞。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汉民族对外族文化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雍容大度，特别是在汉唐时代。汉代民族间的交往特别是经汉末的民族融合，西域各民族的音乐舞蹈传入内地，大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经过南北朝的分治、隋末的动乱，更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使北方少数民族的音乐舞蹈、雕塑绘画、诗歌艺术都传到了内地。北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分乐府诗为十二类，其中《梁鼓角横吹曲辞》就保存了大量的北朝民歌。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就本是用鲜卑族语作的一首歌，后译成汉语。盛唐就更是一个涵纳